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清代政治与社会

郭松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清代政治与社会

郭松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代政治与社会/郭松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7-5161-6614-7

I. ①清… II. ①郭… III. ①政治制度史—中国—清代—文集②中国历史—清代—文集 IV. ①D691-53②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6023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沂纹 安 芳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2
字 数 305 千字
定 价 6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57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133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自序

这些年，我将过去发表的文章，按类别先后选编了三个集子，即谈国家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商品粮流通和农民生活的《民命所系——清代的农业和农民》（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0 年版），讨论明清赋役改革和商贸运输的《清代赋役、商贸及其他》（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以及论述清代人口流动、婚姻家庭和生育死亡的《清代社会环境和人口行为》（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与前面三本书相比，现在的这本集子，在内容上似稍显凌杂。尽管如此，我还是将所选 18 篇文章作了大体的归类。按照目录所示，开头 6 篇多与国家政策有关；第二组 5 篇可归于社会等级、思想信仰一类；第三组 3 篇谈的是婚姻关系，包括明清两代因宫廷选“淑女”引发一些地方出现的婚嫁异动，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以及夫妻离婚；第四组 3 篇是围绕会典、方志和家谱所作史料史籍介绍与相关评价。最后单列一篇《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系应《中国史研究》编辑部之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而写的研究动态，以期通过对这 50 年曲折历程的回顾，既看到政治和学术之间的同和异，以及无端的政治干预对学术研究所造成的窒息乃至毁坏作用，同时也想说明在学科建设中注意传承借鉴和探索发展的重要。

这次辑编集子，面对有的文章，我常会情不自禁地浮现起当年围绕论文写作所发生的一些人和事。

《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一文，原是我 1960 年进历史所后，在杨向奎先生指导下配合读书所写心得中的一个短篇，经补充完善，成了近两万字的论文。此文写作时，除得益于杨向老的指教，还听取过我所王毓铨、熊德基二先生的意见，其间杨、熊二位更在我原稿上作过文字批改。可惜因发生“文化大革命”，此文被压于箱底，

直到1978年清史研究室为筹办《清史论丛》征集新稿旧作，才得重见天日。拙文刊发后，日本京都大学夫马进教授曾以课堂教学的方式带领学生将其翻译成日文，事后又把译文复印件与对此事的说明信托人转交给我，并表示感谢。对于类似文章压箱十多年的经历，现在已不想多说，因那是那个时代使然，由此遭遇者多矣。让我始终感到温馨的是通过这篇文章，透视出那时老辈学者对年轻学人在业务成长中所作的无私付出和殷切期望。至于夫马进教授和学生选择翻译拙文，虽无足称道，却也显示了日中学术互动的一段插曲。

我写《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也有一则故事可说。20世纪80年代初，号称“黄埔一期”的我院研究生院首届毕业生，历史系中的相当部分人留在所里。他们想有所作为，曾策划编一套历史人物小丛书，不但自己写，也邀进所较早的老同事一块参与，并且也看上了我，于是由王培真出面作游说，题目是“吴三桂”，字数七八万。我在写完小册子后，觉得尚有余味，特别是有些内容可单独成篇，然而却抽不出时间趁热打铁去做。直到1993年，北大准备为我的老师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编纪念文集征稿，这才促使我重温那时集辑的资料，选了一个“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的题目，以拾旧愿。

《述康熙帝整饬吏治》和《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两文的写作，与我参加《清代全史》工作有关。十卷本《清代全史》是我国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确定的历史学科重点项目，我是第三卷主编，同时参加另外两卷的写作。《清代全史》第三卷所含时间是康熙二十一年到六十一年（1682—1722），为了写好这本书，我和参与此工作的同事们相约，希望于动笔之前，能选几个问题作些专题研究。我选了4个，成文者3篇，上述两文，便是如此背景下产生的。

我写《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多少能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史研究热潮搭上些线。文化史研究的重兴，吸引了很多人参与，发表的文章不少，并有所谓大文化、小文化之说，但在热闹中，我总觉得虚的多了些，实在的稍嫌不足。在我看来，必要的理论探索是应该的，但最终还是要回归对实际问题的考究。我写关羽崇拜是讲思想信仰的，似可归于文化史一类，目的就是想表达我心目中文化史研究的样子。就在此文发表前后，社

会上兴起一股研究关羽信仰的潮流，记得历史所还收到一封建议成立关羽研究会的信，要求响应。也许所里想起我曾写过这样的文章，便要我斟酌作答，然后以科研处的名义回复。在研究室，同事定宜庄说，她收集过不少周边国家如朝鲜、越南以及有华人、华侨聚居的西方国家修建关庙、信奉关帝情况的资料，建议一起写本小册子凑热闹。我则承诺再找一千个州县兴建关庙的样本，以分析明清两代民间关羽信仰的传播和发展。更有一位与出版界有交情的朋友表示，只要工作完成，保证让其尽快出版。尽管三人谈得热闹，但却身不由己，因为手头都有一摊脱不开的事停不下来，以致十几年后回想起来还觉遗憾。

促使我写《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是源于先前作孔府研究时对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面的反思。1963年夏秋，我和当时明清史研究组的同事们在杨向奎先生带领下，到山东从事曲阜孔府档案的整理工作。迨至80年代初，先是题名“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的档案资料由齐鲁书社付梓（共24册），接着我们的研究成果《封建贵族大地主的典型——孔府研究》，亦于198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对于此书，我觉得限于那时所处的时代，在某些观点上不免有偏激不全之处，总的感觉是满意的。但当我听到一位行家谈意见，认为档案之外，没有更多地利用其他资料，从而限制了对面的展开。由于此说牵涉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的问题，这让我深受震动，并自问，如果当时能在资料收集上更放手些，注意把孔府与同时的其他贵族地主做些横向对比，那么此书的水平是否会更上一层楼。于是我写了《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的文章以作尝试。此文原本两万来字，曾提交参加一个讨论会。遗憾的是当它被选入论文集时，因限于篇幅，编者将其删削了一半多，很多用以说明问题的资料被砍去了，而且目前已无可作弥补的底稿可寻，想起它便感到有些惋惜。

《明清两代诏选“淑女”所引发的社会骚动》本自我早先所写《川剧“拉郎配”史实考》的小文字，刊登在中华书局编的《学林春秋》上，后因《故宫博物院院刊》编辑部向我索稿较紧，于是想起之前的这篇短文，决定以此为底本，进行重写扩写。又由于该文开头引述日本《华夷变态》中的一段资料，遂加了“由日本史籍记载谈起”的副标题，发表后，意外地引起一些日本学者的关注，有的还给我寄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有关资

料，这也算是与文章有关的小掌故。

《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一文，是我当时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的李中清（James Lee）教授之邀而写的。此前，李和台湾“中央研究院”刘翠溶教授等合作，将《玉牒》中记录有关清皇族男女出生、婚嫁、爵职、死亡等8万人的信息（总共20余万人），输入电脑进行研究。1992年中，李与我联系，设想于次年初在北京开个阶段性成果讨论会，邀请国内包括史学、民族学、地理学，以及气象和医学史方面专家参加。我除帮助筹备会议，同时写了这篇文章。因为会议开得不错，所以由我具体操作，合编了一本《清代皇族人口行为和社会环境》的书，交北京大学出版社于1994年9月出版。尽管这只是一部分量不大的论文集，却在学术圈里得到相当热烈的反响。这也许与当时人口史研究中，利用电脑做大容量的人口数据分析还不多见有关。我的文章不是本课题的主体，但配合主体，与主题相扣。

回顾我的学术生涯，从1960年进入历史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前期的30多年时间里，其主要精力多从事于如《中国史稿》、“曲阜孔府档案”整理与研究、《清代全史》、《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史》、《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中国政治制度通史》、《中国经济通史》等所院乃至国家大项目。因此，那时所发的论文基本上都与这些课题有关，有的是为配合项目所做的专题研究，也有是事后的副产品。如此状况，直到我退休前后才有所改变，能比较自由地按照个人兴趣选题写文章，这从本论集以及先前所编三个集子中可得到一定的证实。再说我几个集子所发文章的时间，最早在1979年，晚的至2012年，前后亦延续30余年。这30余年，正是我所主要从事的清史研究领域发展最快的时期，新资料层出不穷，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延扩，所以这次编集子，对于有的文章是否需要入选，我确颇存犹豫，因为它的某些观点和在资料占有上，已显得有所欠缺。但继而又想，若该文大体能与10年、20年乃至30年前的水平相抵，那还不是毫无意义，因为至少能从中窥见学术发展的某种轨迹。当然也有文章，因其所述内容至今尚少有人触及而仍保持着一定的新鲜感。不过就我主观而言，无论是早前和后来的文章，都本着仔细求实的态度去写的，并力争在资料掌握和方法运用上，有所前进，有所突破，这也是我敢于把

本文集呈现于大家的原因。

为了突出主题，我将本书取名为《清代政治与社会》，这是基于其中的部分文章是讲国家权力运行，属于政治史的范畴。至于冠以“社会”二字，那是指论文中讨论的等级结构、道德文化、思想信仰，都与社会总体环境有关，可以说基于什么样的社会，便会有什么样的道德准则、信仰崇拜和婚姻行为，是在具体问题中包含着宏观的内容。

最后，本文集在选编过程中，曾得邱源媛和邢新欣两位博士的帮忙，待稿子到了出版社，我却因身体不适住医院、疗养，致不少本应由作者完成的事，都推给了出版社郭沂纹编审，增加了她的负担。对于她们的付出，我都致以衷心的感谢。

郭松义

2014年12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	(1)
三藩事件后清朝的军制改革	(29)
述康熙帝整饬吏治	(47)
康熙朝官员的“捐助”活动	(75)
曲阜“孔府档案”中记载的乾隆南巡和东巡	(85)
嘉庆间图钦、图敏信奉天主教论处案	
——兼及宗室苏努获罪被纠史实拾遗	(101)
论明清时期的关羽崇拜	(109)
曲阜孔府与明清贵族地主	(130)
清宗室的等级结构及经济地位	(143)
清代的妇德实践	(164)
清代刑案中记录的蒙汗药	(182)
明清两代诏选“淑女”所引发的社会骚动	
——由日本史籍记载谈起	(192)
清代人口流动和婚姻地域圈的关系	(207)
清代婚姻关系中的离婚	(219)
清朝的会典和则例	(258)
清代地方志的纂修	(268)
孔姓宗谱和孔氏家族组织	
——介绍曲阜孔府所藏家谱资料	(276)
中国社会史研究五十年	(289)

江南地主阶级与清初中央集权的 矛盾及其发展和变化^{*}

明崇祯十七年（1644），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进入北京，推翻了腐朽的明朝封建政权，给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在这种形势下，满族贵族势力趁机入关，向新建的大顺农民政权发动反扑。清朝入关，不仅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使农民革命的胜利进程遭到破坏，而且在汉族地主阶级内部，也引起了剧烈的思想上的震动和政治上的分化。大体说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省的北方地主阶级，由于受到农民军的猛烈扫荡，迫切期望依靠清朝的军事力量来实现其封建复辟，向农民阶级反攻倒算。清朝统治者也打出了“与流寇争天下”、为明朝“雪君父之仇”的旗号，大力笼络汉族地主阶级，所以在广大北方地区，很快出现了满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共同建立清朝封建统治的局面。但是在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差异，情况就有所不同，汉族地主阶级和清朝统治者之间，经过几次力量的较量，直到康熙初年才完全结合起来。

清初，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关系中所经历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顺治二年（1645）五月到四年（1647）四月，即从清军进兵江南起，到江南地主阶级策动清朝驻松江提督吴胜兆反清投明失败为止，这一段基本上属于两个敌对营垒的斗争，其焦点是维护明朝还是拥

^{*} 本书述及的江南地区，主要指苏南的苏、松、常、镇及太仓等府县，有时也包括浙江的嘉、湖地区，所谓江南地主阶级，也是指这个地区的地主阶级。

护清朝，反剃发斗争是中间的高潮；第二阶段从顺治四年（1647）四月到十八年（1661），这基本上属于清朝封建政权内中央朝廷和地方绅权势力的斗争，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控制反控制，也就是新组成的统治集团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著名的江南奏销案，就是上述矛盾的总爆发。当然，这二者之间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有参差、互有联系。

由于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政权，而在初年又采取了诸如强迫汉族人民剃发易服等具有强烈民族压迫形式的政策，引起广大汉族人民的愤怒和强烈反抗，这就使得江南地主阶级与清朝统治者的矛盾斗争中，往往染上了民族的色彩，江阴、嘉定等地的反剃发武装起义，是最突出的例子。但是，由于江南地主阶级反抗清朝，主要是为了维持旧日的政治经济权益不受侵犯，因此，斗争必然具有很大的妥协性和局限性，而且越到后来，这种民族的色彩也就愈加淡薄，这与当时广大中下层群众的抗清斗争，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有关情况，我们再结合具体内容，进行探讨。

—

江南地主阶级政治力量的不断加强与江南地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是分不开的。江南地区，早在唐宋时期，就已经是全国的重要财赋中心。明朝以来，这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更明显的进展。从明朝中叶开始，封建国家为了保证财政收入、稳定封建秩序，一方面继续从江南地区榨取高额税粮；一方面也在政治上大力扶植江南地主阶级，以取得他们对明朝的支持。洪熙（1425）以后，明朝政府不断扩大科举名额，江南地主阶级总是获益最多，同时他们进入朝廷做官的人数也急速增加，形成了所谓明代“江南缙绅独盛”的局面。

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所拥有的由一定的经济力量决定的政治权力，又反过来保护和帮助扩充着经济利益。江南地主阶级也是如此，他们利用不断扩大的政治特权，在封建国家的庇护下，疯狂兼并土地，接受投靠，迫使大批农民沦为“缙绅豪右”之家的佃农，有的甚至成为奴仆。所

谓“吴中之民，有田者十一，为人佃作者十九”^①，“明季缙绅多收投靠，而世隶之邑，几无王民矣！”^②典型地反映了江南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力量不断膨胀的事实。当然，与此相关，这也说明了江南地主阶级与农民、奴仆之间阶级矛盾的尖锐和深刻。

因此，江南地主阶级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和明朝的统治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尽管到了晚期，江南地主阶级也反对当权的阉党的某些政策，并受到“阉党”的迫害。但是，他们中不少人以“清流”自居，打出保卫封建秩序、反对肆意劫夺的旗帜，正表明他们是为了维护明朝统治的最高利益而战斗，是明朝统治集团中一支十分重要而又活跃的政治力量。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进入北京，以及清朝统治者入关，改变了原来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关系，也给江南地主阶级带来了新的严峻局面。江南地主阶级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对于清朝进关追剿农民军的行动，采取了积极赞许的态度，但是他们却不欢迎清朝代替明朝，更反对清朝向南方进军。

江南地主阶级所表现出来的立场与它当时所处的地位是有关系的。在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革命风暴激荡下，江南地主阶级作为明朝统治集团中的重要一员，也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是，由于起义军始终没有进到江南地区对当地的封建势力来一次大扫荡，他们的身家财产也没有受到直接接触和损害。因此，他们就不像北方地主阶级那样，需要立即跪倒在满族贵族的脚下，乞求清朝来帮助其恢复失去的权势。对于江南地主阶级来说，怎样保卫既得的权势，使之不受侵犯和干扰，这才是考虑的中心。因此，当李自成退出北京后，整个农民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而在清朝的统治愈益向全国扩展的形势下，江南地主阶级自然更感到清朝政权对它的威胁。^③

①（清）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②（清）孙之騄：《二申野录》卷8。

③ 早在明朝末年，江南地区的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群众，由于受农民起义军的影响，纷纷起来反抗。当时，农村中的抗租抗粮斗争十分活跃，在城镇中也不断发生罢市或抢米、抢粮的风潮。到李自成攻入北京、灭亡明朝以后，更爆发了激烈的“奴变”运动。平日深受剥削和压迫的奴隶们，呼拥而起，向主人们报仇雪恨，索还卖身契，极大地打击了地主富豪们的威风。但是，由于运动具有很大的自发性和分散性，所以，还不足以在政治上构成对江南地主阶级的严重威胁。

这是一场改朝换代的政治大变动的威胁，意味着封建统治集团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调整和组合，何况这里面还包含着新的民族矛盾因素。

1644年5月，在江南地主阶级积极的策划和推动下，在南京建立了以福王朱由崧为头子的南明政权。江南地主阶级拥立福王政权的目的是，首先是复辟明朝统治，希望有一个按照他们愿望控制的坚强的南明政府，以便反抗北京的大顺农民政权，并镇压尚在南方继续发展的农民起义，稳定已经十分动荡的江南局势，保持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权益。但是，由于这个政权实际上就是明末腐朽统治的继续，因此福王刚刚即位，内部就陷入无穷无尽的争权夺利和互相倾轧之中，江南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头面人物，如陈子龙、夏允彝等，都先后被原来的阉党排挤出南明小朝廷，与江南地主阶级在政治上有紧密联系的南明官僚史可法等，也被迫出镇扬州，郁郁不得志。只有个别的如钱谦益之流，由于公开投靠阉党，才勉强在政治上分得了一杯羹。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当然无法稳定局势，后来更无力阻止清军的南下。

江南地主阶级等在南京建立福王政权，对于清朝统治者说来，无疑是一种对抗行动。如前所述，清朝入关，目的不只是和北方地主阶级一起镇压大河南北的农民起义军，与南明政权划江而治，而是要取代整个明朝、建立一个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全国性政权。顺治二年（1645）初，当清军围剿农民军的战争刚刚取得初步胜利，便急不可耐地着手准备进军江南，以便趁南明政权立足未稳就把它消灭掉，打消南方地主阶级重建明朝的希望。四月二十五日，清军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首先夺取屏藩江南的重镇——扬州，接着于五月初抵达长江边，十五日就攻破南京，灭亡了福王政权，随即又连下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及浙江的嘉兴、湖州等地。

清朝军队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抵抗，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席卷江南地区，除了说明南明小朝廷的腐朽无能以外，还与当时广大中下层人民的动向有重要的关系。众所周知，清朝政府的这次军事活动，和它在北方的战争，性质上是不同的。在北方，主要针对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合流对付革命农民的一种反革命的阶级战争；而进军江南，则是为了消灭南明福王政权和残存的明朝势力，是满族贵族和一部分已经同清朝合流的汉族地主，与另一部分坚持拥明抗清立场的汉族地

主之间的斗争，是一种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因为战争的性质不同，广大人民群众在对待清朝的态度上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来。在北方，清军入关之初，到处出现农民群众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革命斗争；而在江南却是另外一种景象，广大中下层群众，并不立刻表现为对清朝统治的反抗，而是充分利用清朝代替明朝的这一统治空隙点，纷纷起来与明朝腐朽统治和直接压榨奴役他们的江南地主豪绅展开斗争。

当时，在江南的很多地区都爆发了直接针对豪强地主的武力行动。正如列宁所说：“这些群众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地受人掠夺，而在动荡时期，整个危机形势和‘上层’本身都迫使他们去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①曾经一度受到南明政府镇压的“奴变”运动，又蓬勃地开展起来。像松江、太仓一带，都再次兴起斗争。其他如金坛、溧阳各县，亦无不聚众起义，被称为“削鼻班”“珐琅党”等组织，在斗争中显得十分活跃。^②上海附近的群众，还以“乡兵”名义进行活动，他们处决了一批“众人公愤”的赃官富豪，使当地的地主分子心惊肉跳。^③佃农运动也风起云涌，像宜兴，因为“国家受天命，豪强皆失势”，有的农民起而乘之，并发动“不得耕缙绅之田，以窘辱其子孙”。^④太仓一带还有名叫“乌龙会”的组织，参加者的成分虽然比较复杂，但基本上仍是一些受压迫的下层群众，如“市井卖菜佣人”等，甚至还有“佃户”^⑤，斗争的锋芒，也主要指向那些往日压迫剥削他们的富家大户。

江南地主阶级面对着如此急速变化的形势，思想上是没有足够准备的，因而显现出某种彷徨和无所适从。他们当中，有些人夹杂在“欢迎”的人群中，以绅士耆老的资格向清军献图献籍“匍伏谒见”，但内心却忐忑不安地在窥测方向；有的“尽室窜匿，惴惴惧不免”^⑥；有的人则发出

① 列宁：《列宁全集》第21卷《第二国际的破产》，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90页。

② 见同治《金坛县志》卷15《轶事》；嘉庆《溧阳县志》卷8《武备志》；《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江宁巡抚毛九华揭帖》。

③ （清）曾羽王：《乙酉笔记》。

④ （清）储方庆：《通庵文集》卷5《荒田议》。

⑤ 《研堂见闻杂记》，《痛史》本。

⑥ 康熙《无锡县志》卷22《行义》。